

爱、伟力与民族之思的深刻表达

——评艾卜·卡赛姆·沙比诗集《生命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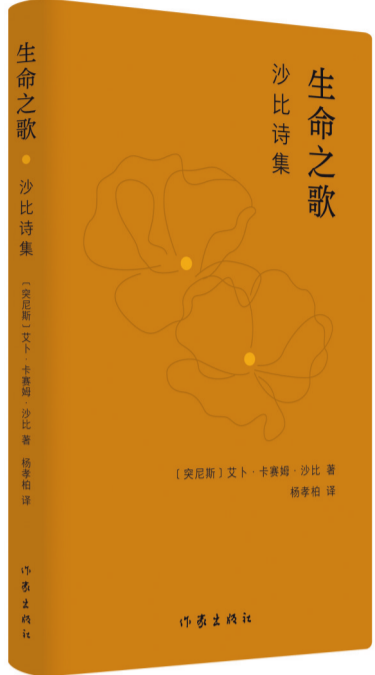
□钱风强

今年，中国担任突尼斯国际书展主宾国，这是中国与突尼斯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回顾中国与突尼斯文学交流的历史，突尼斯诗人艾卜·卡赛姆·沙比的《生命之歌》是一部标杆性的作品，这部作品是这位在世仅25年（1909—1934）的诗人生前自编的一部诗集，于1955年由突尼斯东方书局出版。生命短暂，但诗歌永恒。在中国，从1961年的法文译选本（作家出版社出版），到1987年的阿拉伯文直译本（杨孝柏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再到今年4月份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的《生命之歌·沙比诗集》（杨孝柏译），不仅见证了这部诗集在东方诗歌国度的传播进程，也广大读者深入了解这位远在非洲世界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思想及文本风貌提供了典型样本。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中国最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这尤其适用于解读沙比和他的诗歌世界。一方面，自小萌生的文学天赋，良好的教育，以及在青年时代深受西方文学、阿拉伯侨民文学的精神启蒙，造就其对本国古老教育及僵化体制的叛逆心态；另一方面，自1920年代兴起的突尼斯资产阶级运动，内在而深远地影响着沙比的思想 and 行动，也由此引起他对法国殖民者和当局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或厌恶。此外，因父亲早逝所带来的生活重担，以及因身患重病（心脏病）而不得不退隐休养，也是诗人自19岁开始便接二连三遭遇的关乎生存和生命的沉重课题。这三方面合力主导着诗人生命和精神的演进历程，也是促成其诗歌思想及美学风格生成的根源所在。

破禁锢、反封建、求真理，作为其诗歌思想的总主题，在这部诗集中得到充分展现。他在《穿过黑暗》《致全世界的暴君》《黑暗中的风暴》《在黑暗中》等诗中诅咒一切黑暗与残暴，以及在《新的黎明》《随着时代前进》《美丽的突尼斯》等诗中呼唤自由，探寻真理，都在表明：诗歌之于沙比，已非单纯的文学爱好，而首先是介入现实和关切时代的有力武器。这种反禁锢、反封建的战斗精神，一经在诗中铺排、展开，便在文本内部生成一种震撼人心的伟力。在此，青春激情与理想诉求合二为一，对“黑暗”现实的揭露批判与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待同步展开。不管“黑暗”多么强大，他依然满怀战斗激情，正如他在《美丽的突尼斯》中所说：“这是个黑暗的时代啊，可我已穿过黑暗看到了光明。”这些诗歌所表达的主题，以及在诗中所传递的民族情感和时代情绪，也代表并传递了彼时一部分不满现实、渴望进步的现代青年人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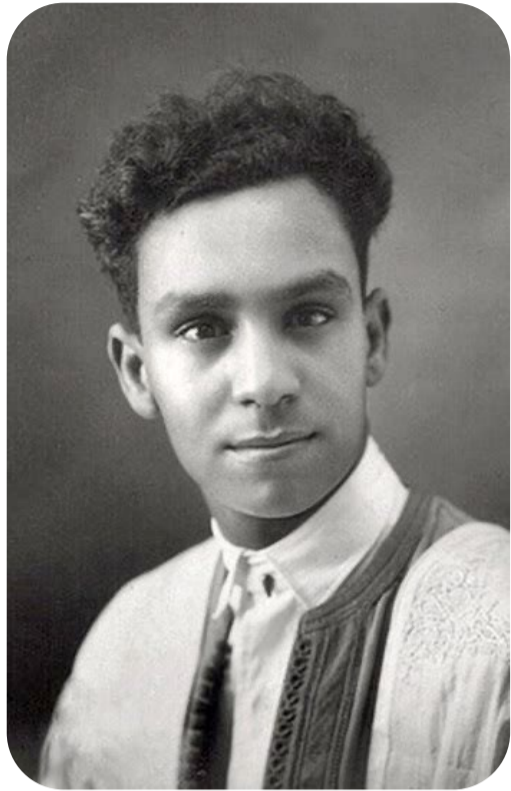
书写自然、表现爱情、歌颂母爱，是这部诗集的三大主题。对花草树木、风霜雨雪、山海湖泊等自然界万物的观照与描写贯穿于其诗歌写作始



《生命之歌》.[突尼斯]艾卜·卡赛姆·沙比著,杨孝柏译,作家出版社,2025年4月

终，尤其在《诗人的心》《雷霆之歌》《啊，我的同胞兄弟》《我的诗》《致人民》等诗歌中借此升华为对自由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象征表达，则可窥见其从自然万物中寻求诗意和思想力量的主体实践。对爱情的表现，对母爱的歌颂，以及以此为中心所展开的对于种种爱之形态的勘验性表达，在《爱情》《啊，爱情》《神圣的母爱》《为了爱情，我对你哭泣》《孤儿的哀怨》《看见你》等众多诗歌中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些诗歌对爱情和母爱的表达，显然不局限于个体视角，而总是由之上升为一种关乎生命本体或民族寓言的总体性书写。

叩问生命、礼赞英雄、张扬意志力，也是这部诗集中一个引人瞩目的表达向度。在沙比的绝大部分诗歌中，大都内置一个“我”，虚拟一个“你”，并在“我——你”之间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在这种言说中，既有精神代偿意义上的生命体悟或灵魂独语（比如《自白》《未免太甚了，我的心，你期望什么》《我的心对神说》），也有更为宏阔也更为复杂的由万物交互而成的“史诗”诉求（比如《巨人之歌》《无名的先知》）。由此，他的诗歌既向内深度指涉，建构了一个深邃的精神世界，又向外大幅拓展，广联



艾卜·卡赛姆·沙比

驳杂的现实世界，从而达成了对于生命和时代的偏于形而上表达的本体书写。沙比对理想人格及其力量的体认，最终都要落实到对巨人、英雄、人民等宏大象征体的比照方面。无论《巨人之歌》——普罗米修斯这样唱借助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呼唤现代英雄诞生，还是《致人民》直接以“人民”为中心的直言说某种神力或伟力，都鲜明体现了这一总体趋向。

沙比的诗歌是一个有“我”的世界，展现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所特有的既内敛又外张的艺术激情。他长于抒情、情绪与节奏和谐统一；在局部善用比喻，化万物为意象；在整体上想象奇特，空间宏阔。这就使其诗歌意蕴丰盈，主题多元，韵律感强，富有音乐美。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策划部主任)

“一带一路”文学之光



赫尔曼·布洛赫，一个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熟悉的名字。有些作家是属于大众的，有些作家的命运似乎注定与孤独为伍，他们寂寞地躺在书架上，仿佛一位背影寥落的智者等待与读者对话。对于后者，我们习惯将他们理解成“作家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们的声望更多地靠同行的赞许而非广泛读者的接纳。布洛赫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纷繁复杂的精神世界、高强度的象征、梦游式的独白写法，以及大段大段的哲学思考，共同形成了进入他作品世界的门槛。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这样评价《维吉尔之死》：“布洛赫的这部作品以其所探讨的主题以及完全独创、诗意盎然的语言风格，弥补了普鲁斯特和卡夫卡之间、不可挽回的过去和尚未到来的未来之间缺失的一环。换言之，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一座桥，维吉尔以之跨越已逝过去与未到未来之间的空寂深渊。”

阿伦特评论中提及的“缺失的一环”，究竟是小说艺术中怎样重要的一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普鲁斯特的作品追忆的是美好时代所逝去的一切庞杂与优雅，换言之，那是最后的“整体”，是价值中心尚未崩溃前的世界。而卡夫卡的世界则是未来世界，一个到处充满权力异化的非人世界。在这二者之间，小说艺术需要给出自己的答案，也就是面对中心崩溃后的个体何去何从，在非人世界尚未到来的时刻，人类存在是否尚有救赎的可能？

这就是布洛赫尝试回答的问题，也是他的杰作《维吉尔之死》的精神内核。以诗的语言、小说的形式来写哲学随笔，似乎是布洛赫一以贯之的风格。

“欢乐与末日”

布洛赫1886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有的犹太纺织工厂主的家庭，作为白手起家的家庭中的长子，他和卡夫卡共享了近似的家庭期待与束缚。这意味着早年的他不必为生计发愁，与此同时他将作为家庭事业的接班人被培养，而非任由他追求个人兴趣。他很快就显示出对数学、哲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强烈热爱，成为一名纺织工程师，并因其对数学的热爱还发明了混棉机的一项专利（与同事一起）。他的全能才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维特根斯坦，他们也像最后的回光返照的“文艺复兴人”一样，可以极为轻松地跨越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

“欢乐末日”一语出自流亡美国期间的布洛赫，他在为与他同时代的霍夫曼斯塔尔作品选作序时，在总结那个时代的氛围时，使用了这一词汇。欢乐与末日，看起来矛盾，实则是极为敏锐的洞察。

政治上，这一时期的奥地利正是哈布斯堡王朝由衰落逐渐走向崩溃的过程；经济上，由于约瑟夫皇帝较为开明的政策吸引了很多商人到维也纳创业，布洛赫的父亲正是这些人里的一员；文化上，整个欧洲在当时只有巴黎可以与之相颉颃。文化艺术活动丰富，智识阶层诞生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弗洛伊德、马勒、托马斯·曼、埃贡席勒……

风雨飘摇的大帝国，因为战争这一催化剂，随时面临解体，政治上没有安全感的人们，智识上思想活跃的人们，感到了个体在面临大时代冲击时的无力，纷纷逃向了思想领域和艺术世界。布洛赫也在其中，他一面深受震撼，一面在与社会各项运动的摩擦中，尝试给出自己的理解。他感到一切都成为碎片，正如诗人叶芝在《基督重临》中所言，“中心再也保不住了”。虚无感深深攫住了他和他的时代。正是这些思考与布洛赫自身的生命经验，促使他写下了《维吉尔之死》，并且在这部作品中投射了他完整的哲学思考与具体而微的生活痕迹，那就是对“流亡与死亡”的恐惧以及对它们的认识。

“弦乐四重奏的形式”

在按部就班地生活了近四十年后，39岁的布洛赫入读维也纳大学，在那里学习了九个学期的哲学。随后，他不顾家人反对卖了父亲的纺织厂。1938年德奥合并的时候，他曾被短暂捕入狱，此前一年他已经开始了这部不朽著作的创作。后来几经周折，布洛赫最终流亡到美国。他经历了奥匈帝国的解体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坍塌，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法西斯主义对人类文明的践踏……这些政治经验都推动了他的思考与批判。

1945年，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维吉尔之死》德文、英文版同时出版。小说聚焦诗人维吉尔临终前的一天内活动与思考。或许是继承了德国浪漫主义的余绪，当时的欧洲作家（不仅德奥系）都有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他们排斥庸俗的市民生活，蔑视平凡，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为艺术家或诗人。这种反抗本身可以视为崇尚个体尊严与价值，并以此来对抗平庸与苦闷的人生，逃离现实世界的一则宣言。这些在《维吉尔之死》中也有所体现，布洛赫借维吉尔之口，反思了美、诗、艺术的效用，这些孤僻的、与世人脱离的诗人，写下耽溺于美的颂歌，他们过的是不是一种虚假的、没有真实的爱的生活呢？凡此种种都与布洛赫流亡美国时期的个人经历有巨大关联。他在美国的生活并不富裕，经常为经济来源的稳定性而焦虑不安，即便如此，他一旦获得一些机构的奖金，他会立刻用于救助那些深陷德国的苦难同胞。这也在《维吉尔之死》中，尤其第三部分“土——期待”中借助维吉尔和皇帝屋大维的对话与辩论展开。

斯坦纳曾评论道：“《维吉尔之死》采用了弦乐四重奏的形式，不同章节文字模仿了对应乐章的情绪与节奏。赫尔曼·布洛赫作品中的技巧实验，不是轻佻的炫耀，而是一种必需，它来自伦理需要，以及找到合适的象征形式，去充分表达摸索中的知识分子或先知的痛苦、愤怒、震惊的需要。”

整本书分为极具象征意味的四个篇章：“水——抵达；火——下行；土——期待；以太——归乡”。

“水”这一章主要写了维吉尔病重，跟随皇帝的舰队抵达意大利南部海港布林迪西姆。这里涉及到的神话人物是海神波塞冬，他写了海上航行到抵达的瞬间记忆与遭遇。少年、奴隶、陋巷中辱骂嬉笑的人们……水在这里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它可以是生命之水、记忆之水、流动不居的一切，包括尘世间的权力与荣耀，它们看起来是那么不可靠，最终都会如水般逝去。

“火”这一章中，主宰维吉尔下行世界的神话人物是火神伏尔甘。本章也是全书最为晦涩难解的部分，布洛赫在这里几乎不再动用任何情节与人物对话，呈现给读者的是维吉尔的思考，他不断地深入，我们跟着他进入艰深的认识论的世界，与此同时又会一次次被他自身的反理所推翻。这里他重点写了维吉尔的高烧，这也是一种火的象征。此外，火在这里意味着生命的高烧——维吉尔的情感，他回忆了情人与家人，同时还意味着“献祭、鲜血、重生之火”，以及现实世界的火山之火。

“土”是本书最精彩的章节，也是最有重量的部分，集中展现了维吉尔与两位朋友以及屋大维的辩论。奥古斯都（屋大维）代表的是尘世的权力秩序，维吉尔代表的则是精神力量，他们都缔造了罗马，一个以权力，一个以语言。二者之间的论争，有可能也是布洛赫自身两种思想的矛盾，他用维吉尔超越精神的论调否定奥古斯都的功绩，又用奥古斯都的愤怒驳斥诗人的傲慢与虚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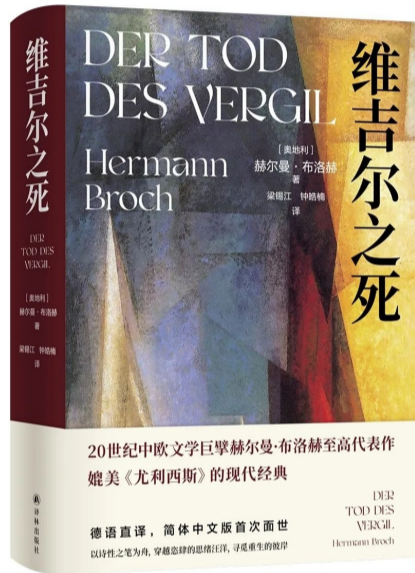
“以太”是一个多义的名词，这一章综合了布洛赫所熟悉热爱的几大领域——神话传说、古希腊哲学与物理学。或许，我们可以换个好理解的說法：“维吉尔神游太虚幻境”。维吉尔在此虚空之境“方生方死”“亦生亦死”，他历经了与女性、少年、奴隶等人的身份合一，消解了性别、阶层和年龄，然后他又与动物、植物相遇，直到最后与石头、结晶体这种毫无生命的物质相遇。他的经历正与上帝创世的过程反过来，我们可以说这是布洛赫让维吉尔在经过虚无主义笼罩的虚空深渊后，以宗教的神秘与爱，为人类存在和救赎留下了一丝微弱光亮，至此，人类也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返乡。

(作者系书评人)

「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返乡」

——读赫尔曼·布洛赫《维吉尔之死》

□李晓愚



《维吉尔之死》，赫尔曼·布洛赫著，梁锡江、钟皓楠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11月

■ 动态

《外国美学》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4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优势学科主办，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扬州大学文学院和《外国美学》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文明互鉴下的美学研究——纪念《外国美学》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党委书记兼所长丁国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徐海，扬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定勇，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原总编辑程孟辉，中华美学学会会长、《外国美学》主编高建平，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社长樊黎明，以及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出版单位、文化团体的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1985年，《外国美学》集刊创刊，由朱光潜任顾问，汝信任主编。2005年，《外国美学》于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复刊，在原有18辑的基础上又编了24辑，形成了每年2期的常态编辑出版机制。40年来，《外国美学》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已成为引介国外美学学术动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具有广泛影响力。

与会者围绕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办好《外国美学》、推动国内外外国美学研究发展、构建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深入交流。大家表示，美学对促进文明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外国美学》自办刊以来始

终紧跟我国学术发展的前沿，承载着推进美学研究、促进学术交流的使命，不仅见证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成长，而且为全球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源，为推动中国美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新时代的美学研究既要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学资源，探索现代美学问题的本土化路径，也要广泛吸纳外国美学思想资源，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美学发展创新。

会上举行了赠书仪式，《外国美学》工作会议同期举行。

(王 冕)

■ 书 讯

《光明与黑暗的辞典》出版

挪威作家西蒙·斯特朗格的历史小说《光明与黑暗的辞典》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光明与黑暗的辞典》记录了作者妻子家族亲历的故事。妻子的祖辈被挪威最令人畏惧的纳粹头子送往集中营，战后，一家人竟住进了刽子手囚禁、暴虐审讯同胞们的房子里。不寻常的命运转折带来了苦难，历史的重担威胁着几代人之间的关系。为了抵抗遗忘，他决定去历史中寻找，重新讲述死者和生者的故事。在犹太人的传统中，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当他们的生命停止跳动时，另一次则是当他们的名字最后一次被提及、念出或是想起时。只有到那时，逝者才会消失，与尘世彻底告别。

《光明与黑暗的辞典》的目录和结构独具匠心，严格遵循挪威字母表构建26组叙事单元，每个词条都是微观史切片，一片又一片拼图讲述人性善恶。“我们生活在言语战争的时代。”作者决定用语言为武器，把所有人经历的一切编成辞典，记录光明，也铭记黑暗，只为不要忘记。

作家诺拉·克鲁格读完《光明与黑暗的辞典》后谈道：“本书深刻且温地探讨了我们是如何成为自己，以及个人的决定如何影响他人的人生。通过作者创造的生动场景，斯特朗格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战争如何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如何占据地方、建筑、物体和人。最终，这部杰作承担起个人责任的承诺：记住那些不再在这里的人，让他们永垂不朽，并认识到我们正是由自己的过去组成。阅读这本书是一场深刻的情感体验，尤其是在反犹太主义重新兴起的时代，它的人性光辉让你充满希望。”

西蒙·斯特朗格(Simon Stranger, 1976—)自2003年以来已出版13部小说和青少年作品，2014年凭借《那些不存在的人》获北欧理事文学会文学奖提名。长篇小说《光明与黑暗的辞典》于2018年出版后好评如潮，荣获挪威书商奖，并在国际上取得了成功，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刘 玄)



突尼斯视觉艺术家斯坎德尔·克里夫摄影作品

壹果文壇

SHIJI WENTAN